

日本瓷器初期发展研究 *

熊 寰

内容提要 关于早期的日本瓷器有“肥前瓷器”、“肥前陶瓷”、“伊万里（瓷器）”、“有田（瓷器）”、“古伊万里”等多种名称，指代不明，含义混乱。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日本文献的相关记录和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了日本瓷器创烧的时间，进一步探讨了在日本瓷器初步的发展阶段，日本国内的官方干预和国外的相关因素对其产生了促进作用。

关键词 日本瓷器 肥前 创烧时间 官方干预 国外因素

日本瓷器出现于17世纪初^{〔1〕}，从出现至17世纪中叶是其初期阶段，这一时期在日本一般又被称为“初期伊万里”时期。这一阶段日本瓷器从无到有，发展迅速，虽然还不够成熟，但为以后的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日本瓷器史上具有不可忽略的地位，本文将对这一阶段日本瓷器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 日本瓷器名称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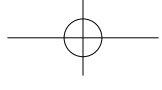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日本瓷器名称复杂而含糊，有“肥前瓷器”、“伊万里（瓷器）”、“有田（瓷器）”、“古伊万里”、“肥前陶瓷”等名称，以至于三上次男曾感慨：“关于用初期伊万里、古伊万里、伊万里等等称呼来作为时代别名的办法是很模糊不清的。”^{〔2〕}所以，为了便于讨论，首先需对日本早期瓷器的一些名称进行辨析。

首先是“肥前陶瓷”和“肥前瓷器”。“肥前陶瓷”，顾名思义，包括“肥前陶器”和“肥前瓷器”。其中“肥前陶器”仅是指“唐津烧”；“肥前瓷器”则是指肥前地区出土的全部瓷器。从日本瓷器起源至明治维新前的这两百多年时间里，日本瓷器以九州佐贺县有田为中心，包括有田瓷器、波佐见瓷器和平户瓷器等周边瓷业在内，形成了一个大面积产瓷区，总体面貌较为统一。在江户时代，这是日本唯

* 本文获中山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编号：1109121)。

〔1〕 关于日本瓷器起源时间的论证详见后文。

〔2〕 [日]三上次男：《日本·朝鲜陶磁史研究》页95，东京：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89年。



一长期持续生产瓷器的地区¹⁾，也是日本“最大的瓷器生产基地”²⁾以及“日本制瓷业中心”³⁾。该产瓷区范围相当于现今的佐贺县和长崎县大部分地区，历史上曾属于古肥前国，故名“肥前瓷器”。由于此名称无歧义，因而是目前日本学界使用最多的名称。

其次是“伊万里(瓷器)”与“有田(瓷器)”。“伊万里(瓷器)”这个名称流传最广，也最有影响。伊万里是日本九州佐贺县境内的一个港口城市，是江户时代日本瓷器的主要出海港之一，故“伊万里(瓷器)”一般被认为是取自这个港口城市的名称，大桥康二谈到：“仅仅是在有田一带不大区域的窑中所烧制的瓷器，销售时都要从毗邻的伊万里港出海，后运送至日本国内，于是消费地人们便以装运港名称命名称之为‘伊万里瓷器’。”⁴⁾应该说这种推测是合理的：一是以外输港口来命名所购瓷器的现象并不少见，如“南京瓷器”就曾是日本和西方人对景德镇瓷器的称呼；二是在日本瓷器产生的早期，伊万里市尚未发现窑址，但其时却有关于“伊万里瓷器”的记载，如在1638年松江重赖的《毛吹草》“唐津今利ノ烧物”以及1639年凤林承章《隔蓂记》中有“今利烧藤实染渍之香合”，其中的“今利(烧)”⁵⁾即是指“伊万里瓷器”⁶⁾。以上都说明了伊万里市当时仅仅是个运输港口而已，“伊万里瓷器”并不是指在伊万里市生产的瓷器⁷⁾。

关于“伊万里瓷器”的具体所指，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有田瓷器”是“伊万里瓷器”的一部分，不能混称，如大桥康二明确指出“伊万里瓷器，以有田瓷器为中心，包括波佐见瓷器和平户瓷器等”⁸⁾。这里的“伊万里瓷器”实际上就是“肥前瓷器”。理由是依据传世品和考古资料，同为肥前瓷器的“波佐见瓷器”和“平户瓷器”，与“有田瓷器”面貌基本一致，属于一类风格的瓷器，只是质量稍逊，价格更便宜，但它们却未必从伊万里港输出，如距伊万里港较远的“平户瓷器”就从附近的平户港出海，故大桥康二在谈到“伊万里瓷器”名称来源时，也强调是“仅仅在有田一带不大区域的窑中所烧制的瓷器”从伊万里港出运。另一种观点认为，“伊万里瓷器”就是“有田瓷器”，《有田町史》谈到：“有田瓷器因为从伊万里出港，又称伊万里或伊万里瓷器。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它从前一直用有田陶

1) 其中石川县九谷古窑在17世纪中叶曾小规模烧瓷，约持续20年；以有田技术为基础的姬谷烧瓷器大约也只生产了20年左右。

2) [日]大桥康二：《肥前磁器の変遷——文様を中心として》，九州陶瓷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Ⅱ》页87，有田：九州陶瓷文化馆，2004年。

3) 前掲《日本・朝鮮陶磁史研究》页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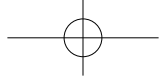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4) [日]大桥康二：《古伊万里的文様：初期肥前磁器を中心に》页19，东京：理工学社，2006年。

5) 也有称为“今里(烧)”。

6) [日]大桥康二：《肥前陶磁》页6，东京：ニュー・サイエンス，1993年。

7) 明治后，日本国内统一以生产地命名，“伊万里烧”就仅仅指佐贺县伊万里市制作的瓷器，跟本文所讨论的“伊万里(烧)”不是一个概念。

8) 前掲《肥前陶磁》页6。



器或有田瓷器这样的名称。”¹⁾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肥前瓷器的“生产中心地”在有田²⁾，精品皆产自有田，从伊万里港口出运，所以消费地所谓的“伊万里瓷器”其实主要是指“有田瓷器”，现今日本收藏者也常如此混称。但是，在日本瓷器外销时代，虽然“有田瓷器”是日本销往欧洲的主要出口瓷，但“平户瓷器”也有许多销往了东南亚，然而在消费地依然被称为“伊万里”，也即对于海外消费地而言，“伊万里瓷器”成了对江户时代“肥前瓷器”的代称，虽然当时大部分日本外销瓷确实出自有田。因此，如果将“伊万里瓷器”等同于“有田瓷器”，则忽视了“肥前瓷器”的其他类型。故笔者认同“有田瓷器”是“伊万里瓷器”一部分的这一观点，这样含义明晰而不会有歧义。

最后是“古伊万里”，这也是一个较复杂的概念。一是广义上的概念，即指“肥前瓷器”。“广义上的古伊万里就是从创始期(1616)到衰退期(1828)约两百年间在肥前广大地区烧造的全部瓷器”³⁾。当然，下限也可延至明治初，这取决于对古代肥前瓷器分期的划分。二是狭义的概念，即指“有田瓷器”中的一种装饰风格，其与“柿右卫门”风格和“锅岛”风格并列为“有田瓷器”的三大装饰风格。这种概念下，关于它的起止时间，有多种不同看法：水町和三郎认为，“古伊万里”的正式发展阶段是从宽永中期(1633)到文政末年(1828)，即不包括日本瓷器的创始期⁴⁾。而且，从纹样、风格上看，逐渐摆脱了中国瓷器和朝鲜王朝瓷器的影响，过渡到追求和风(不包括“柿右卫门”和“锅岛”)，从染织、浮世绘、印版绘本等中取材，确立了纯日本风格样式⁵⁾；西田宏子认为，“古伊万里”从17世纪50年代开始，即宽文末期(1672)至正德末期(1715)是古伊万里风格的确立和顶峰时期⁶⁾；矢部良明认为“古伊万里”和“柿右卫门”风格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为17世纪70年代，流行时期为元禄年间(1688—1703)到享保年间(1716—1735)⁷⁾。可见，虽然学者们对起始时间有争议，但大都认同其成熟时间约在元禄年间(1688—1703)。同时，作为“有田瓷器”重要风格之一的“古伊万里”风格体现的是典型的日式风格。

综上，广义的“古伊万里”与“肥前瓷器”同义，狭义的“古伊万里”则是“有田瓷器”的主要风格流派之一；“伊万里(瓷器)”含义则有所分歧，或认为等同于“有田瓷器”，或认为等同于“肥前瓷器”。由于从伊万里港出运的“有田瓷器”是“肥前瓷器”的主流和精品，在日本之外的消费地根据传统习惯把“伊万里(瓷器)”等同于“有田瓷器”，或泛化为“肥前瓷器”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学术研究中应使用更加准确且无歧义的“肥前瓷器”或“有田瓷器”称谓为妥。

1) [日]宫田幸太郎执笔：《有田町史・陶業篇1》页342，有田：有田町，1988年。

2) 前掲《肥前磁器の変遷——文様を中心として——》页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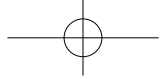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3) [日]水町和三郎：《古伊万里的製品》，古伊万里调查委员会：《古伊万里》页91，佐贺：金华堂，1959年。

4) 前掲《古伊万里的製品》页91。

5) [日]永竹威、宫田幸太郎执笔：《有田町史・陶芸編》页167，有田：有田町，1987年。

6) [日]西田宏子：《日本陶磁全集23・古伊万里》页61—66，东京：中央公论社，1976年。

7) 前掲《有田町史・陶芸編》页286。



二 日本瓷器创烧时间

在明晰了日本早期瓷器的各种名称后，日本瓷器的出现时间成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古肥前国地区是日本瓷器最早的诞生地，在17世纪前期也是日本唯一瓷器产地，但对于肥前瓷器产生于何时，却一直有不同观点。

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日本瓷器创烧于1616年(元和二年)，由朝鲜籍陶工李参平(金ヶ江三兵卫)在有田首先烧制成功。李参平是在丰臣秀吉向朝鲜发动文禄庆长战争时被锅岛部队从朝鲜带回的陶工，当时日本尚不能生产瓷器，李参平到日本后在有田泉山发现了可以烧制瓷器的瓷石，并在白川天狗谷里建窑，率先在日本烧制出白瓷，日本瓷器生产由此开始。这次战争以日本失败告终，唯一的重要成果可能就是促进了日本瓷器的产生，所以又被称为“陶瓷战争”。

该观点的依据来源于1653年(承应二年)李参平的家书，家书中记录了李参平于“丙辰之年”(1616)迁移到有田皿山，“先祖朝鲜人陶工参平在锅岛军回国时被带到日本，他起初寄居于多久长门长官那里，之后移居到有田，发现了泉山的陶土场，并在白川天狗谷里建窑”^①。但这个说法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根据有田天狗谷古窑的发掘报告，并不能明确天狗谷古窑是建于1616年。三上次男在报告书中称：“天狗谷古窑至迟始创于1616年，并实际上有可能更早。如果更早，那么传统看法上的‘1616年’可能是对有田瓷器或李参平的一个纪念性的时刻。”^②二是文献中虽然说明了李参平首先在有田泉山天狗谷烧制瓷器，但无论是发掘报告还是文献记载都没有明确说明这是日本首次成功创烧瓷器，所以把李参平到有田皿山的年代当作是日本瓷器始烧的年代是缺乏确凿证据的。

另一种观点是，据《皿山代官旧记觉书》记载，有田瓷器大约在庆长年间(1596—1615)始烧，书中记录家永壺岐守比李参平更早进入有田并在天狗谷开窑。家永壺岐守起初是佐贺郡高木村的陶工，在有田乡小沟原(现有田町西部小沟)烧窑，但随着陶土用尽，家永壺岐守的孙子正右卫门不得不四处寻找矿场，无意中进入皿山，并发现了瓷矿场，开始在白川山的天狗谷建窑烧制瓷器。^③但这在发掘中也缺乏明确的考古证据。

而且，上述两个观点从文献上都只能说明天狗谷窑的始烧情况，并不能说明有田瓷器甚或是日本瓷器的始烧情况。何况支持这两种观点的文献都登录在150年后的文本上^④，并非当时文献，可靠性值得商榷，故上述两种关于日本瓷器起源的观点较难令人信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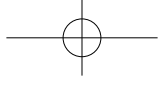
随着近年日本陶瓷考古的进一步发展，大桥康二作为肥前陶瓷考古的代表人物，根据肥前陶瓷窑址发掘调查情况，认为“天狗谷为最早的古窑的可能性不大，而应该是位于有田町西部的在西有

① 《金ヶ江家文書》，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頁544—546。

② [日]三上次男：《有田天狗谷古窯・白川天狗谷古窯址発掘調査報告書》頁188，东京：中央公论社，1972年。

③ 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頁19—25。

④ 前掲《古伊万里の文様：初期肥前磁器を中心に》頁19。



田町地区分布的唐津烧陶器窑中开始烧成瓷器。总之，瓷器的出现是唐津陶器窑不断试制的结果，逐渐成熟”¹，并提出日本瓷器始烧于17世纪10年代，这与文献记录的时段大致吻合。虽然凭借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还难得出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在尚未有更明确证据的情况下，根据考古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以唐津室烧瓷器的大致年代(即17世纪10年代)作为日本瓷器始烧的年代区间，还是谨慎可行的，该结论也正逐步得到日本学界的认可。

在有田瓷器初期，除了以上两个见于文献记载的代表性陶工外，还有“宗传”和“百婆仙”陶工夫妇比较有名。在有田町报恩寺藏有一块“百婆仙碑”，是由“百婆仙”曾孙“宗仙”在其50年忌日(1705)时设立²，其上记载了“宗传”来自朝鲜深海，他在庆长战争中被带到日本，起初在武雄市内田皿山烧制陶器，被称作“新太郎烧”，歿于1618年。其妻“百婆仙”在丈夫死后率960余在日朝鲜人一起移居到有田开窑，并协助儿子平左卫门在有田烧制瓷器，被称作有田皿山的创始人³，广受当地朝鲜陶工和后辈们的尊敬。虽然这也是关于有田瓷器起源的一种观点，但影响不大，因为在时间上肯定晚于李参平的烧造，何况李参平的烧造也未必是始烧，所以“百婆仙”并不会是有田瓷器的始烧者。事实上，《有田町史》也认为“百婆仙”是在丈夫死后，听说有田发现了高质量的瓷石，瓷器生产变得兴盛，才带领深海一族搬迁到有田)稗古场来的⁴。

上述几位陶工在日本瓷器起始阶段均对瓷业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虽然不能断定他们为日本瓷器的创烧者，但以他们三个家族为中心的三大制瓷群体无疑是日本瓷业初期阶段的重要制瓷力量。

三 日本瓷器发展初期的官方干预

日本瓷器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便是官方对瓷业的干预。在日本瓷器发展初期，官方的干预与管理对瓷业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1. 1637年的窑业整合事件

日本瓷器创烧以后，需求日渐旺盛，烧窑时需要的松木材大增，导致了对山林的过度砍伐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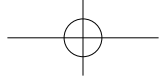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1〉 前掲《古伊万里の文様：初期肥前磁器を中心に》頁19。

〈2〉 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頁26。

〈3〉 [日]矢部良明：《初期伊万里染付の起源と展開》，座右宝刊行会：《世界陶磁全集8・江戸(三)》頁149，东京：小学馆，1978年。

〈4〉 [日]宮田幸太郎等执笔：《有田町史・通史編》頁37，有田：有田町，1986年。

〈5〉 根据对有田一带窑业的统计，211个窑所需要窑柴的林木面积多达约4204公顷，而据1970年伊万里市的统计资料，伊万里市的国有林只有1758公顷，因此，一方面有田窑业在明治七年的奥地利博览会、美国、法国有连续获奖的盛况，另一方面又受困于窑柴的缺乏。〔日〕原口静雄：《窑业燃料》，伊万里市乡土研究会：《鍋島藩窯とその周辺》增补改订版，頁172－174，佐世保：艺文堂，1984年〕。



当时的佐贺藩士山本神右卫门重澄¹认为事态严重，于是向藩厅作了汇报，导致藩政采取了行政措施。据其留下来的《山本神右卫门重澄年谱》记载，在瓷器产地，由于窑工过度伐林烧窑以致荒山，藩主遂于1637年3月19日(宽永十四年)通过多久美作长官下令：解散日本陶工826人，其中男532人、女294人，但归顺的朝鲜陶工后代不在此范围内。结果导致伊万里町4个窑、有田町7个窑共计11个窑被废弃，整合后共剩下13个窑场，形成了以内山为中心的窑业圈²。

关于这一事件，表面上佐贺藩是出于保护山林的目的而抑制瓷业，但其实背后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首先，必须看到山林在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一方面，保护山林有利于蓄积水土和抗击灾害，如文政十一年(1828)阴历八月九日，强台风引发了皿山火灾，大半住房烧毁，于是灾民向藩政申请购买山林木以建房³。另一方面，山林也是重要建筑材料。当时的山林分为藩属林、武士家臣的私有林和民有林三个部分，由于林木是建设材料，故受到各方重视，藩政鼓励植林，甚至对于农民在租地上农作时新植的树木，只要育才良好，都会被禁止砍伐，并得到相应的补偿款⁴。

其次，山林是藩的重要财源。据《泰国院样御年谱地取》记载：1779年(安永五年)8月，佐贺藩面对严重的财政困境，通过出售藩属山林还欠款、再以抵押担保作新借款的双重措施解除了财政危机⁵。因此，藩政重视山林保护之心是合情合理的。

不过，仅是这样的原因，很难解释在整合事件仅针对日本陶工的排斥。因为在同期窑址中发现，“质量低下的支垫叠烧陶器等消失了”⁶，这说明被解散的那些日本陶工应该大部分是生产低质陶器的。也就是说，佐贺藩在保护山林的同时还对窑业洗牌，希望利用有限的资源集中生产高品质的瓷器，以便获取更高的价值，扩大财源。

所以，出于多方面原因，尤其是试图在有限资源下大力发展瓷业的决心，佐贺藩对瓷业进行了大规模直接干预，这也达到了提高瓷器质量的良好效果。

2. 对本地瓷业的保护

佐贺藩在成立专门管理窑业的机构之前，曾直接派官员对窑业进行保护性管理。比如当地官员山本神右卫门曾与来自大坂的商人达成了1642及1643年的“山承包”交易，以“一年上交20贯运上银

〈1〉 山本神右卫门在1635年(宽永十二年)赴大木任“横目”一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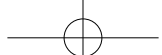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2〉 前掲《有田町史・通史編》页41，有田：有田町，1986年。

〈3〉 《代官旧記・請筋へ相達諸伺一通・文政十一子年日記》，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页401。

〈4〉 熊本大林区署编：《佐贺藩林制沿革史》页89，熊本：熊本大林区署，1922年。

〈5〉 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页397—398。

〈6〉 前掲《肥前陶磁》页23。



为条件”，但最终以“大阪商人的巨额亏损逃回大坂而告终”⁴¹。在有田本地瓷业迅速发展的时候，外地瓷商却因被收重税而亏损逃离，说明佐贺藩对外地商人抬高准入门槛，以此来保护本地瓷业的发展。

3. 设立“皿山代官”制度

1648年佐贺藩在有田设立“皿山代官所”，作为直接管理窑业的官方机构²，负责人被称为“代官”，由锅岛藩任命，也直接隶属于锅岛藩主，“皿山代官”制度随之确立³。“皿山代官所”的作用除了直接对窑业进行管理外，还负责对窑业征税，这也是“皿山代官所”设立的初衷。有田瓷业在初期阶段虽然发展迅速，但上缴的税收却非常少，一年才2贯100文，所以相关官员一直试图提高有田瓷业的税收，上述山本神右卫门对大阪商人收的重税即是典型例子。也正是鉴于山本在财政方面的政绩，在1647底⁴他被藩主任命为首任“代官”⁵，上任的第一年(1648年)就收取税收77贯688文⁶，与1641年相比，8年间瓷业税收增长了约35倍。税收迅速增长，促使日本瓷业规模的迅速扩大。据出土资料显示，17世纪40年代圈足无釉瓷器大量增加，说明这些瓷器取消了耗时的圈足施釉工序，同时在各遗址中出土的17世纪40—50年代这一时间段的瓷器所占比重较之前明显增大⁷，这些都说明了税收提高后，有田瓷业为了保证利润，只能提高生产效率，扩大制瓷规模，从而有力地刺激了瓷业的迅速发展，反过来又必然会进一步增加藩政的税收，最终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综上，佐贺藩官方的干预和管理起到了较好的促进作用，它既采取了提高瓷器质量的措施，又注意扩大瓷业的规模，而且还注重对本地瓷业生产的保护，最终有力地刺激了有田瓷业的发展，为其日后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日本瓷器初期发展中的外来因素

日本瓷器在初期阶段发展得非常迅速，短短几十年后就开始外销，拉开了与中国瓷器国际竞争的序幕⁸。日本瓷器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除了与上述内因有关外，

〈1〉 前掲《肥前陶磁》页24—25。

〈2〉 直至1871年废置藩窑时才废除此机构(有田町史编纂委员会：《有田町史・政治・社会編 1》页23，有田：有田町，1985年)。

〈3〉 “皿山”是指窑场的意思。“皿”的直译为盘、碟，象征瓷器，因此“皿”在这里指代瓷器；而“山”是指烧窑时的阶级窑依山而建，所呈的斜面似山一般。另外“皿山”也称“皿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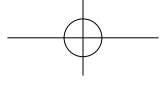
〈4〉 事实上是从一六四八年正月八日才上任(前掲《有田町史・政治・社会編 1》页3—4)。

〈5〉 前掲《有田町史・政治・社会編 1》，页3。

〈6〉 前掲《肥前陶磁》，页25。

〈7〉 前掲《肥前陶磁》，页25。

〈8〉 熊寰：《中日瓷器海外竞市研究——以景德镇和肥前瓷器为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



外力对日本瓷器的推动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外力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分别是朝鲜、中国和荷兰。

首先是朝鲜因素。朝鲜归顺陶工对日本瓷器初期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理由如下：第一，上述文献明确提到了以李参平和百婆仙为代表的朝鲜陶工来到有田制瓷，虽然不能确定是否是他们首先制作出瓷器的，但朝鲜陶工无疑是日本早期瓷器发展的重要力量。第二，有田瓷器初期品种为白瓷和青花，不见彩瓷。朝鲜15世纪便会制作青花，16世纪流行白瓷，但却没有掌握彩瓷技术，这与日本瓷器初期生产状况相符。第三，受技术和原料限制，白瓷和青花的制作难度远较青瓷和黑瓷大，故通常情况下早期的瓷器多是青瓷和黑瓷，而日本瓷器从一开始就出现了白瓷和青花，起点非常高，如果没有外来技术介入是很难做到的。第四，关于上文提及的1637年的窑业整合事件，佐贺藩为了保护山林，将有限的薪材资源配置到更高品质的瓷器生产中，淘汰了有田11处窑场，驱散日本陶工826人，基本上只剩下朝鲜陶工。经过整顿后，原来窑址中的低档品少见了，这说明当时朝鲜陶工制瓷水平要高于日本陶工，而此时离日本瓷器的始烧年代并不远。根据以上四点，说朝鲜陶工对日本瓷器的初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并不为过。

其次是中国因素，表现在三方面：

一是日本瓷器的创烧动力之一很可能就是为了占有日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市场。在17世纪初日本瓷器创烧之前，日本对中国瓷器的需求量非常大，不仅大量进口中国瓷器^①，甚至还专门到中国订烧瓷器以满足多样需求，如在2007年景德镇观音阁窑址发掘中就出土了“天文年造”(1532—1554)款瓷片^②。而以景德镇瓷器为代表的优质中国瓷器远销到日本，价格较贵，很难能满足日本市场对中国瓷器的全部需求。日本瓷器的初期形态似乎也能证实这一点：日本瓷器初期虽然以朝鲜技术为基础，但纹样风格却与朝鲜瓷器不同，而是完全模仿中国明末瓷器风格^③。这应该能说明日本瓷器初期阶段的主要生产目的之一是为了弥补与满足对中国瓷器大量需求所产生的缺口，一定程度上可谓是中国瓷器的替代品。

二是中国制瓷技术对日本瓷器发展的促进。近年来日本瓷器考古发掘表明，“肥前瓷器在1650年前后引入中国的技术完成了明显的技术革新”^④，如“墨弹”技法^⑤、模范成型技法、圈足内底涩圈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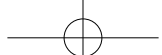
① 见诸于众多的日本考古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文章和图录，如[日]小野正敏：《14—16世紀の染付碗、皿の分類とその年代》、[日]上田秀夫：《15・16世紀の染付碗、皿の分類とその年代》，《貿易陶磁研究》第二輯，1982年；長谷部乐尔、今井敦：《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东京：平凡社，1995年。

② 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景德镇观音阁明代瓷窑址考古发掘》，《文物天地》2008年第7期，页92。

③ 熊寰：《中日瓷器比较研究——以1610年代—1860年代景德镇和肥前瓷器装饰为例》，《艺术史研究》第14辑。

④ [日]大桥康二、铃田由纪夫等：《古伊万里の見方シリーズ3:装飾》页4，有田：九州陶瓷文化馆，2006年。

⑤ 所谓“墨弹”，主要是利用了墨与钴料两者在烧成时的反应不同，先用墨笔描绘纹样，然后在器面上填涂钴料，由于墨中含有胶质，烧成时钴料并不会粘附，所以随着烧成之后，墨与钴料都同时消失了，于是露出很细的白色线状纹样。此外，由于上釉时墨容易渗到釉里影响效果，所以有时在上釉之前会先素烧一次，墨被彻底挥发掉后再上釉，二次烧成，这样就不会有瑕疵。



烧法、乳钉支烧法等。这些新技法对肥前瓷器装饰工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墨弹”技法在效果上比直接用锐物刻划留白的技法要显得更美观柔和，又如在17世纪40年代出土的制彩瓷的白胎中，采用了乳钉支烧技术以防塌底，可以提高烧成率。

三是赴日中国陶工对日本瓷器发展的推动。以彩瓷为例，由于朝鲜当时没有彩瓷，在日本的朝鲜陶工当然也不会制作彩瓷，所以日本瓷器在创烧初期没有彩瓷。日本的彩瓷产生于17世纪40年代，据《酒井田柿右卫门家书》的《觉》篇记载，伊万里陶器商人东德岛左卫门向在长崎的中国人支付礼银学习制作彩瓷，在正保三年(1647)成功制成¹⁾。这说明明清更替之时在日本长崎有掌握制作彩瓷技术的中国陶工向日本人传授技艺，并直接促成了彩瓷在日本的产生²⁾。由于日本彩瓷创烧伊始就使用了中国技术，所以风格与中国彩瓷很相似。以彩瓷盘底足为例：此前日本其他的盘类器物中，口径与圈足径的比例为三比一到四比一或者更小……彩瓷足径则明显变大，一般达到口径的二分之一或以上³⁾，而这种大足径正是同期中国盘类底足的常见现象。这样，日本彩瓷在中国陶工带来的技术的帮助下，发展迅速，至17世纪50年代便趋向成熟，甚至开始外销，比如在1659年日本就有“50件绘有红彩和绿彩”⁴⁾的瓷器运往摩卡⁵⁾。

最后是荷兰因素。在明清更替之乱以前，荷兰东印度公司都是从中国进口瓷器，但在1644年明朝灭亡之后，南方的抗清战争持续，战争因素使瓷器出口开始迅速减少。在1644年，仅两位商人就为荷兰订购了35万5千8百件瓷器；至1646年，档案记录显示“由于中国旷日持久的战争，为荷兰、巴达维亚、科罗曼德尔、苏拉特和波斯最多只能采购到9万5千件瓷器了”⁶⁾，至1647与1648两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则几乎未有瓷器贸易记录。⁷⁾此后几年虽然还有少量瓷器贸易，但正如1652年的记录“不会超过之前的年份了”⁸⁾，及至1657年，中荷瓷器贸易便暂时中断了。

但是，荷兰对瓷器的需求迫切，于是荷兰东印度公司转向了日本。这是因为：一，地理因素，

〈1〉 《酒井田柿右衛門家文書》，前掲《有田町史・陶業編1》頁553。

〈2〉 从考古资料上看，日本在1637年窑场整合前不见彩瓷及用作制彩瓷的白胎，而此后白瓷比例增加，已施有青花作大轮廓线的彩瓷白胎逐渐在窑址中多见，并常伴有过烧、色调散失等状况〔日〕大桥康二：《肥前の色絵磁器》，《東洋陶磁》第二十二号，頁5—30），这也能印证日本彩瓷大致出现在1640年代。

〈3〉 〔日〕柴田名彦：《有田民窯磁器の変遷試論》，九州陶瓷文化馆编：《柴田コレクションⅠ》頁218，有田：九州陶瓷文化馆，199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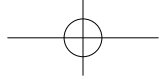
〈4〉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30.

〈5〉 摩卡位于中东也门，是当时红海附近的一个主要商港和集散地。

〈6〉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p.51—55.

〈7〉 在1647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只有销往日本一件茶壶的记录(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24)，运到巴达维亚的瓷器记录实为上一年度的交易(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56)，1648年则无贸易记录。

〈8〉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56.



中日邻近交通便捷；二，从营销角度考虑，“日本瓷器显得‘稀罕’和‘非常新奇’，很可能会激发起荷兰及欧洲其他地方人的好奇心和羡慕心理，因此还是有一定可能获利的”³¹；三，上述日本通过引入中国制瓷技术，完成了技术革新，其制瓷技术在17世纪50年代得到较大提高，有了承接大规模订单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荷兰东印度公司或让日本瓷器“以中国瓷器为原型”³²，或“发送碟、罐等样式”令日本仿制³³，因此，日本瓷器迅速填补了中国空白出的国际市场份额，这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档案上也能得到印证：165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试探性购买瓷器，仅为145件³⁴，其后数量迅速上升，据不完全统计³⁵，1652年为1,265件，1654年为4,258件，1658年为5,257件³⁶，1659年跃升为56,700件³⁷，也即迟于1659年日本瓷器就进入了大规模外销阶段³⁸。

荷方如此大规模的订购，必然大大促进日本瓷器的生产，窑址发掘表明，日本瓷窑在17世纪50年代烧造能力大大提升，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装烧上开始用桶形匣钵叠烧³⁹，这样就大大利用了窑内空间，而且匣钵封闭的烧成环境也有利于烧成率的提高；二是在窑内烧成室的进深和幅宽平均由约2—3米增至各约4米⁴⁰。

综上所述，早期日本瓷器在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并在不久的以后走向繁盛。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中心]

(责任编辑：项坤鹏)

〈1〉 T.Volker, *The Japanese Porcelain Trade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fter 1683*, Leiden: E.J.Brill, 1959, p.10.

〈2〉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31.

〈3〉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45.

〈4〉 [日]山胁悌二郎：《有田町史・商業編1》页372—378，有田：有田町，1988年。

〈5〉 这里不计入非生活用瓷，如1653年日本向巴达维亚出口的2200件药罐，应是医用定制瓷，不能算作一般意义上的外销（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25）。

〈6〉 前揭《有田町史・商業編1》页372—378。

〈7〉 T.Volker, *Porcelain and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Leiden: E.J.Brill, 1954, p.131.

〈8〉 由于日本德川幕府从1633年后开始实行“锁国”政策（至1853年才结束），并在1639年颁布命令驱除葡萄牙船，只允许荷兰和中国商船赴长崎贸易（石井良助校订：《德川禁令考》前集第6，页375—379，东京：创文社，1981年），所以日本主要是依靠荷兰东印度公司向东南亚和西方等国际市场出口瓷器。

〈9〉 大桥康二，尾崎叶子执笔：《有田町史・古窯編》页202，有田：有田町，1988年。

〈10〉 前揭《肥前陶磁》页91，图36“肥前古窑烧成室规模的变迁表”。